



戈巴契夫上臺後的蘇聯與中共關係

畢英賢



（本文係作者於今年六月十一—十四日參加由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舉辦的第十六屆中、美「中國大陸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編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被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總書記，成為蘇聯的政治首腦。當時，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參加蘇共故總書記契爾年科（K. Chernenko）葬禮的中共「副總理」李鵬，與戈巴契夫於三月十四日會面。這兩個於五十年代同時在莫斯科讀大學的中蘇共領導人物，此次相見，自然是分外親切。①戈巴契夫曾表示，「蘇聯方面要認真改善對中共的關係」；李鵬答稱，中共方面「持有相同的渴望」。^②

事實上，當時中蘇共間的關係正常化過程業已開始，而且已經有了顯著的進展。不過，在戈巴契夫執政的兩年多之內，由於他在國內進行全面改造（Perestroika），在國際上推行彈性外交，因此對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發生了激勵作用。相對的，中共繼續推行現代化，在內部政治情勢上也發生了起伏。這些因素自然也會反映在中蘇共關係上。

兩年多以來，雙方實質關係已經產生了有感的改善。有趣的是，莫斯科與北平對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成就並未大肆宣傳。相反的，在中共方面，經常重述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給一般人的印象是，如果蘇聯不消除這些障礙，他們之間的關係就無法改善。事實的發展並非全然如此。這三個障礙是：駐在中蘇邊境及外蒙的蘇軍；蘇軍佔領阿富汗；蘇聯支持越南侵佔高棉。

去（一九八六）年七月，戈巴契夫在蘇聯的遠東地區發表了蘇聯的新亞太政策，其中特別重視對中共與日本的關係。這顯示

註① 戈巴契夫於一九五一年獲准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Law Faculty, Moscow State University）就讀，一九五五年畢業。李鵬於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動力學院就讀，並曾擔任中共留蘇學生會主席。

註② 消息報（Izvestiya），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第三頁。

戈巴契夫上臺後的蘇聯與中共關係

了，蘇聯改善對中共的關係比以往更具大意義。③蘇聯新亞太政策對中蘇共關係正常化過程將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本文擬檢視戈巴契夫上臺後，中蘇共雙方外交政策取向、實際關係的演變和特點以及其發展可能趨向。

蘇聯與中共的對外政策

今年二月十六日，戈巴契夫對參加「擁護無核世界，擁護人類生存」國際會議的國際人士說，蘇聯正進行革命性的改造，它的國際政策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受到國內政治的制約。易言之，「蘇聯人需要持久的和平」。④按照蘇共二十七大的各項基本文件，蘇聯現行對外政策的主要方針包括：(一)為內部建設，確保外在的有利條件，消除戰爭威脅。(二)加強與共黨國家間的合作關係。(三)在和平共存與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四)發展與第三世界的友好關係。(五)加強聯絡非共黨國家的左傾勢力，繼續支援國際工人及民族解放運動。⑤

同時，蘇聯對外關係的觀念與作風也有了明顯的轉變。首先，戈巴契夫表示，在核子對抗的情況下，處理不同社會制度間，不同國家間以及不同區域間的關係時，需要有新的途徑、新的方法與新的形式。⑥接著，杜布萊寧(A. Dobrynin)，蘇聯前駐美國大使、現任蘇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部長，對戈巴契夫的新觀點加以闡述。他列出六個基本原則：(一)在核子時代中，生存的互賴性具有重大的意義。(二)軍事對抗水平必須降低，應遵守「平等與對等」安全原則。(三)僅靠軍事技術維持安全是不可能的。(四)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是不可分開的。(五)在對外政策上，必須具有高水平的彈性，能夠作出合理的妥協。(六)解決國際安全問題需採取多層面途徑，包含軍事、經濟、政治及人道等。⑦這六個原則，最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蘇共承認，「合理的妥協」在對外

註③ 契托倫科(M. Titarenko) (蘇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所長)，「蘇聯的和平戰略與亞太地區」(“Soverskaya Strategiya Mira i Tikhookeansky Region”)，共產黨人(Kommunist)，第一期(一九八七)，第一〇二頁。

註④ 戈巴契夫，「擁護無核世界，擁護國際關係的人道主義」(“Za Bez'yaderni Mir, 3a Humanizm Mezhdunaronykh Otnoshenii”)，真理報(Prawda)，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七日，第一至二頁。

註⑤ 「蘇聯共產黨綱領」(新版本)(“Programm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yuza”，Novaya Redaktsiya)，共產黨人，第四期(一九八六)，第二三九至一四八頁。

註⑥ 戈巴契夫，「蘇共中央委員會對蘇共二十七次所提之政治報告」(“Politicheskii Doklad Tsentral'nogo Komiteta KPSS XXVII S'ezdu KPSS”)，共產黨人第四期(一九八六)，第六頁。

註⑦ 杜布萊寧(A. Dobrynin)，「擁護無核世界，迎接第二十一世紀」(“3a Bez'yadernyi Mir, Navstrechu XXI Veku”)，共產黨人，第九期(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頁。

關係上的重要性；第二，對「安全」的概念已不同於往昔。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蘇聯外交部召開了一次不尋常的駐外使節會議。會中，戈巴契夫發表演講，^⑧講辭未公開發表。據報導，他提出三個主題。第一，全面評估蘇聯對外政策的優先順序；第二，採用新的談判策略，一改以往祇會講「不」(nyet)的不良形象；第三，消除外交部內部腐化現象。^⑨關於蘇聯對外政策優先順序，蘇共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李珈察夫(E. K. Ligachev)宣稱，蘇聯不使其對外政策與外交活動祇注重對美國的關係。^⑩

一九八六年四月，蘇聯就其對亞洲太平洋政策發表了一個「政府聲明」；七月，戈巴契夫發表海參崴演說。顯而易見，他已把目光投注向亞太地區，圖使亞洲在蘇聯的對外政策中與歐洲並重，使蘇聯成爲亞太地區的主要角色之一，一改以往過份偏重歐美之弊。爲了這個目的，蘇聯外交部進行了部分改組。原有的第一與第二遠東司，改組爲：「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主管遠東共黨國家，包括中共在內)、「東南亞國協局」，及「南太平洋合作局」。^⑪

蘇聯外交優先的調整，對亞太地區外交機構的改組，加上一九八六年蘇聯對亞洲政策的「政府聲明」^⑫與戈巴契夫的海參崴演說，在在說明，蘇聯業已調整了其全球戰略，矯正以往祇注重歐美、而忽視亞太的政策。一九八七年三月，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納澤(E. A. Shevardnadze)連續訪問亞太地區六個國家(泰國、澳洲、印尼、寮國、高棉、越南)，歷時十日之久，誠屬空前活動。

蘇聯內部改造的要求、對外政策觀念的調整、外交作風的改變、外交機構的改組，以及全球戰略的修正等都有利於中蘇共關係的進一步改善。

另一方面，中共自其「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以來，其基本取向未曾有明顯的變化。^⑬

註⑧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⑨ 拉爾(A. Rahr)，「改變之風襲擊外交部」(“Winds of Change Hit Foreign Ministry”)，自由電臺研究報告(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第二十四期(RL274/86)第一頁。

註⑩ 李珈察夫(E. K. Ligachev)，「沿著十月方針，本著革命精神」(Kursom Otkyabrya, v Dukhe Revolyutsionnogo Vorchestva)，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第三頁。

註⑪ 奈欣斯(Richard Natous)，「與北平關係改善之際，中國幫夫勢」(“China Mafia Doomed as Ties with Peking Improves”)，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第三十六頁。

註⑫ 「蘇聯政府聲明」(“Zayavlenie Sovetskogo Pravitelstva”)，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⑬ 「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大公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第六至七頁。

這個政策的要點如下：(一)決不依附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二)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三)以本國與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四)以其長遠的、全局的戰略為依據，決不遷就一時的事變，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動。同時，中共在共黨與共黨關係上，也訂下了四個原則：(一)獨立自主；(二)完全平等；(三)互相尊重；(四)互不干涉內部事務。^⑭在過去數年中，中共外交的言論與實踐大致堅執這些基本方針。也就是在這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運用下，中共與蘇聯關係正常化進入軌道，逐漸發展。隨著這個對外政策的實行，中共在美國與蘇聯之間採取了「等距外交」。^⑮但是，中共並未公開地如此主張。

一九八六年三月，趙紫陽在中共六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作報告時說，中共根據國際形勢的客觀變化及時對外交政策進行了調整、充實和完善。他對中共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提出十項原則，^⑯要點如下：(一)中共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堅持獨立自主；(二)中共決不依附於任何超級大國，也決不同它們任何一方締盟或建立戰略關係；(三)中共屬於第三世界，把加強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團結合作作為其對外工作的基本立足點；(四)中共堅持長期對外開放。至此，中共的獨立自主外交更加顯著，消除了與美國或蘇聯結盟的任何可能。易言之，中共把自己置在第三世界之中，與美、蘇鼎足三分。為了這個目標，北平必然會調整其與華盛頓及莫斯科之間的距離。在這種情形下，中蘇共相互接近乃自然的結果。

一九八六年底，中共發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鬭爭，但中共領導強調，「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⑰一九八七年二月底，蘇共「真理報」(Pravda)轉載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的文章。該文章批評若干中共人員，不分青紅皂白讚揚和美化資本主義。^⑱顯然，蘇聯對中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堅持社會主義路線表示同意與讚許。^⑲這也意味著，中共目前內部情勢不會影響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戈巴契夫海參崴的講辭

一九八六年七月，戈巴契夫到蘇聯的遠東地區視察，在海參崴市的一次集會上，他發表了一篇關於蘇聯如何發展遠東，以及

註⑭ 同註⑬，第七頁。

註⑮ 據日本讀賣新聞(Yomiuri Shimbun)，日本外務省獲得中共一份秘密文件(Confidential document)；文件明白說，北本要在美國和蘇聯間採取「等距離外交」，參見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第四頁；中央日報(Central Daily News)，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第五頁。

註⑯ 「外交政策調整充實，十項原則獨立自主」，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二頁。

註⑰ 「趙紫陽在春節團拜上的講話」，大公報，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第一頁；「鄧小平會晤桑尼亞總統」，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第一頁。

註⑱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Priderzhivarsy Sotsialisticheskogo Puti)，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五頁。

關於蘇聯對亞太地區政策的重要演說。蘇聯無論開發遠東、或推行其亞太政策，都必須改善同中共的關係。因此，他在講辭中多處觸及中（共）蘇關係，並提出具體建議。這些言論與建議是以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表達的。

戈巴契夫對中共的直接表白與建議如下：¹⁹

一、中（共）蘇兩國關係具有重大意義，其原因：第一，兩國相互為鄰，擁有世界上最長的陸上邊界線，兩國人民必須世代相處；第二，在國際發展中，很多事情取決於這兩個「巨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二、近年來，雙方關係已有明顯的改善，但是蘇聯仍願意重申，它準備在任何時間、任何級別上，以最認真的方式討論任何問題，尋求補充措施以創造兩國間的睦鄰氣氛。戈巴契夫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分隔（很願意把「分隔」說成「聯合」）兩國的邊界線會成爲一個和平與友誼的地帶。

三、蘇聯人懷著尊重的心情，去理解中共的「國家現代化」及建設「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可以斷定，中（共）蘇優先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形相似。因此，雙方在實行其計劃時，在若干領域內，沒有理由不相互支持與合作。雙方之間的關係愈好，愈能交換經驗。

四、雙方經濟關係已有積極的改善。戈巴契夫表示相信，蘇中（共）經濟歷史中所形成的相互補充的特性，使雙方擴大經濟關係上擁有很大的潛力，在發展邊境的經濟聯繫上亦然。他說，關於合作，已遇到一些重大問題。例如，雙方都不希望阿穆爾河（Amur，即黑龍江）成爲「水上障礙」，而希望這條壯闊河流的盆地成爲中（共）蘇兩國人民努力的結合因素，爲共同利益利用這裏的豐富資源和水利建設。他正式地說，國界可沿著航道（fairway）劃分。

五、關於在中國新疆維吾爾（Uigar）自治區與蘇聯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之間合作建造鐵路問題，蘇聯準備給予肯定的答覆。

六、蘇聯向中共建議，進行太空方面的合作，願意爲中共訓練太空人。在文化及教育領域內；互惠交流的可能性很大。戈巴契夫說，蘇聯在這些方面「真誠地寄以厚望」。

戈巴契夫在議論其他亞太地區問題時，至少在三個問題上，觸及中（共）蘇關係。²⁰

一、戈巴契夫表示，蘇聯將全面加強與亞洲各國共黨國家的友誼、積極推動與它們間各種形式的聯繫。他認爲，蘇聯與其友邦的平等與團體關係乃是全亞洲與亞太地區安全的組成部分。他指出，蘇聯正與外蒙古討論從外蒙撤出相當部分的蘇聯軍隊的

註¹⁹ 「戈巴契夫的講辭」，眞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九日，第一至三頁。

註²⁰ 同註¹⁹，第三頁。

問題。

二、蘇聯建議召開赫爾辛基 (Helsinki) 式的亞太會議。爲此戈巴契夫提出五點具體說明。其中第一點，蘇聯認爲，東南亞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繫於中共與越南關係的正常化，但是這是它們兩者之間的事務，蘇聯祇希望它們能夠恢復「同志式的對話」、祛除不必要的猜疑。其中第四點，戈巴契夫建議，大量裁減亞洲的武裝力量與傳統武器至合理而足夠的低限。這個問題必須一點一點、分階段解決，從某些特殊地區開始，例如從遠東地區開始。在這方面，戈巴契夫說，蘇聯準備同中共討論具體的步驟，相對地裁減雙方地面部隊的水平。

三、關於阿富汗問題，蘇共領袖說，蘇聯準備撤離駐在阿富汗的軍隊。經與阿富汗政府磋商之後，蘇聯決定在一九八六年底之前，撤回六個團——一個坦克團、兩個摩托化步兵團、三個防空團——及其編制裝備與武器。

以上九點顯示，戈巴契夫亟圖與中共大幅度、快速地改善關係。在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過程中，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的重要性可與一九八二年三月布里茲涅夫的塔什干演說相比。當時，布里茲涅夫在其講辭中表示欲與中共改善關係而提出了四點基本立場。

一、蘇聯從前沒有否認，將來也不會否認在中國大陸上「存在著社會主義制度。」

二、蘇聯始終不承認任何形式的所謂「兩個中國」的概念。

三、蘇聯對中共沒有領土要求，並準備隨時就現有邊界問題繼續談判，以便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四、蘇聯從沒有認爲兩國之間的敵視與疏遠狀態是正常現象。蘇聯準備無條件地與中共舉行談判，以尋求雙方都願接受的措施。在相互尊重對方利益、不干涉對方內政、互惠與不損害第三國的基礎上改善蘇聯與中共的關係。

布里茲涅夫的講辭至少作出三點宣告：第一，重新正式承認中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二，保證蘇聯對中共沒有威脅。第三，蘇聯不打算與中華民國建立任何程度的政治聯繫。與布里茲涅夫所作出的原則性聲明相比，戈巴契夫的表白更具體，且含有一定程度的妥協性。

戈巴契夫的海參崴聲明所隱含的意義包括：第一，尊重與理解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並且表示同意與支持。第二，重視中共在國際事務上的重要地位，把它與蘇聯並列爲「巨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改以往輕視中共的態度。第三，蘇聯在中蘇邊界問題上，首次作出讓步，使中共有可能收回一些失土。

在當前的條件下，戈巴契夫對中共作出一些「合理的妥協」，一改以往祇會說「不」的作風，其動機並不單純。第一，改善對中共關係是蘇聯的新亞太政策的重要部分。蘇聯的新亞太政策的目標在建立其在亞太地區的大國形象與地位，進而與美國在該地區爭奪霸權。爲了此一目的，蘇聯的實際步驟包含拉攏中共與日本，經營東南亞，進入南太平洋。第二，維持中蘇邊境的穩定

情勢，使蘇聯有較多的精神與資源用於加速其國內的「社會與經濟發展」。與中共及日本改善關係後，蘇聯可加速其遠東地區的開發。蘇聯西伯利亞的貝阿鐵路（BAM: The Baikal-Amur Mainline）已完成數年，但是沿三千四百公里鐵道兩旁的廣大地區（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開發計劃剛剛開始。蘇聯有意把其遠東開發為獨立的綜合經濟體。第三，在國際問題上，爭取中共的支持，以便遂行其全球戰略。第四，儘早與中共領袖達成高峯會議，恢復黨際關係，完成關係「正常化」。

中共的反應

一九八五年三月，蘇共前任總書記契爾年科死亡，戈巴契夫接任。中共派遣受過蘇聯教育的李鵬前往莫斯科參加葬禮，並非偶然。李鵬在莫斯科作出幾件令當時世界輿論注目的行爲。第一，李鵬祝賀戈巴契夫接任總書記時，稱呼他爲「同志」；第二，他轉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戈巴契夫的「衷心祝賀」和「良好祝願」；第三，正式稱呼蘇聯爲「社會主義國家」。②這類事情在布里茲涅夫及安德洛波夫死後，蘇共權力轉移時皆未發生。此外，蘇共新任總書記戈巴契夫正式接見了中共副總理李鵬，也是一個破例。總之，從戈巴契夫一上臺，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就有了好的徵兆。

戈巴契夫發表海參崴談話之後，中共的反應緩慢而審慎。相隔數日之後，鄧小平才正式作答。他說，戈巴契夫的談話有一些積極因素，但需要仔細研究；而且中共（蘇）蘇間尚存在「三大障礙」，因此對蘇聯行動仍須觀察一段時間。③一九八六年九月初，鄧小平對美國記者說，在戈巴契夫的談話中有點新意，但對消除「三大障礙」尚未邁開大步。同時，他說，如果蘇聯能在越南撤出高棉方面作出貢獻，這將「消除了中蘇關係的主要障礙」。如果這些問題獲得解決，他會「到蘇聯的任何地方與戈巴契夫會面。」④中共外長吳學謙所作出的反應，與鄧小平大致相同。他強調，戈巴契夫迴避了越南從高棉撤軍問題，令中共不滿意。⑤八月六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俞志忠曾代表北平政權，針對戈巴契夫海參崴講辭作出下列數點答覆：⑥

註② 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第一頁；三月十五日，第二頁；三月十六日，第一頁。

註③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第一頁。

註④ 「鄧小平接受美電視記者訪問」，大公報，一九八六年九月七日，第一頁；國際先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第一頁。

註⑤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第一頁。

註⑥ 「外交部昨答蘇記者問」，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第一頁。

一、雙方對話，問題不在級別，在取得實質進展。

二、關於利用黑龍江水利資源問題，雙方已交換意見，正在擬訂協議。

三、關於太空合作問題，尚在研究之中。

四、關於蘇聯從外蒙部分撤兵問題，俞志忠未予置評。當蘇聯「塔斯社」(TASS)記者要求他評論戈巴契夫關於亞太安全會議的建議時，他表示，爲了保障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蘇聯必須採取實際行動，大量削減已經部署的飛彈核武器，消除阿富汗與高棉兩個熱點。蘇聯記者追問，如果蘇聯做到前述數點，中共是否會贊成召開「太平洋會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拒絕就此一問題提出評論。以往，中共對蘇聯「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公然反對。這次對「太平洋會議」構想，雖然沒有表示贊成，但並未斷然拒絕。

大約在戈巴契夫抵達遠東的同時，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I. Arkhipov)悄悄地到了北平，據事後的報導說，他到中國大陸是「私人訪問」，爲了「針灸治療」。^②不過，據種種跡象判斷，他的中國大陸之旅至少負有三項外交任務。第一，把戈巴契夫講話內容預先知會中共。第二，介紹即將與中共接觸的蘇聯高級官員。一位是蘇聯第一副總理塔里津(N. V. Talysin)，他將接替阿爾希波夫夫人與中共接觸；一位是外交部副部長羅高壽(I. Ruzhachev)，他將取代伊利切夫(I. Ilichev)擔任中(共)蘇定期「政治磋商」蘇聯方面的代表團團長。第三，爲七月十二日中蘇邊界衝突事件解說。在這次事件中，中共一名士兵被殺，數名受傷。中(共)蘇雙方曾就此一事件互提抗議，但未公開報導。中共地方政府事後下結論說，「這不是蓄意的，而是一次錯誤。」^③這一事件如果發生在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必然會引起軒然大波。

顯然，中共也亟需改善對蘇聯關係，祇是顧及美國及西方疑慮，而不願大步進行。就當前形勢而論，中共欲改善對蘇聯關係的動機至少有五。第一，中共同蘇聯一樣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中蘇共關係的改善，不但可確保漫長中蘇邊界線的安寧，而且可節省可觀數量的軍事費用。第二，加強與蘇聯的經濟、貿易、科技的聯繫與合作，可加速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共的現有企業中，其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機器與設備來自蘇聯或東歐各國。因此，技術改造、改建與擴建、補充零組件都離不開蘇聯與東歐。^④第三，標榜獨立自主外交，改善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在七十年代內，中共明顯傾向美國，使其與第三世界關係受損。中共改善對蘇聯關係後，至少可改善其在第三世界的形象。第四，解決越南問題，確保南境安全。第五，加強其在中共、蘇聯及美國戰略三角中的主動性。

註①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第一頁。

註②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第五頁。

註③ 「開創我國外交的新局面」，瞭望，第三十八期（一九八四），第八頁。

關係正常化的進展與特點

就實際情況看，自戈巴契夫就任蘇共總書記後，北平與莫斯科關係正常化過程不僅穩定地繼續進行，而且在若干方面有加速表現。茲將其重要進展列述如下。

一、政治磋商按期舉行，政治關係已獲改善。中共與蘇聯間一年兩次的關係正常化「政治磋商」分別於四月與十月在莫斯科與北平舉行，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以來，從未間斷；一九八六年十月在莫斯科舉行第九回合；第十回合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北平舉行。在磋商過程中，討論範圍業已擴大，雙方新聞公報一再重申，「願意在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及其他領域內的關係。」^②去年，蘇聯第一副總理三度訪問中國大陸；其他方面的政府官員相互往來的次數亦已增加。

二、外交聯繫加強，分別開設領事館。雙方一般關係改善後，外交聯繫隨之增加。一九八六年九月，蘇聯第一副總理塔里津訪問北平與中共簽署新「領事條約」。^③雙方舊領事條約係於二十多年前所簽訂，為適應新變化，新領事條約新增十七條。新領事條約已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在莫斯科互換批准證書。一九八六年底，中共與蘇聯已在列寧格勒及上海分別開設總領事館。同時，中共準備在基輔 (Kiev)、阿拉木圖 (Alma Ata)、伯力 (Khabarovsk) 設領事館；蘇聯則擬在瀋陽、廣州及迪化設領事館。

三、召開副總理級的「經濟、貿易與科技合作委員會」首屆會議，簽署合作文件。一九八六年三月，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與中共副總理李鵬在北平舉行中（共）蘇「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簽署了「中（共）蘇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會議紀要」及「中（共）蘇兩國政府關於相互派遣工作人員條件的議定書」。^④一九八五年時，雙方已決定由蘇聯協助中共建設七個新項目，改建五十年代在蘇聯幫助下建成的十七個項目。這次會議就這些項目進行了進一步討論，同時，共同確定了為加強和擴大中（共）蘇之間的企業合作、經濟和科技合作及其他領域中相互合作的「新途徑和新形式」。雙方規定，蘇聯專家到中國大陸、中共技術人員到蘇聯學習。為推進雙方科技合作，設立了「科學技術合作常設小組委員會」。^⑤

註②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六日，第二頁。

註③ 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頁。

註④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頁。

註⑤ 消息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第四頁。

四、貿易持續成長，相互舉辦經濟貿易展覽會。近年來，中共與蘇聯的貿易逐年增加。例如，一九八三年雙方進出口總額為四億八千八百二十萬盧布，較前一年增長百分之二一八·四；一九八四年為九億七千七百八十萬盧布，增長百分之一〇〇；一九八五年為十六億四百九十萬盧布，增長百分之六四·一；一九八六年約為十八億盧布（依一九八七年初匯率計算約值二十七億九千萬美元），增長百分之十二·五^{③④}。事實上，中共與蘇聯間訂有五年（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長期貿易協定，五年相互貿易總額預定為一百二十億盧布（按簽約時的匯率約值一百五十億美元）。^{③④}雙方為促進貿易發展，一九八六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舉辦了三十三年來首次的、大規模的經濟貿易展覽會，頗能吸引蘇聯人民的興趣。^{③⑤}同年十二月，蘇聯在北平舉辦大規模的工業貿易展覽會，也引起一陣熱潮。^{③⑥}

五、進行科技合作與全面文化交流。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共與蘇聯簽訂二年文化合作協定，在科學、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體育、衛生等方面進行合作和人員交流。^{③⑦}同年六月，在雙方科學院之間，簽訂了科學合作協定及兩年科學合作執行計劃。^{③⑧}目前，蘇聯「塔斯社」與中共「新華社」，中共經濟日報與蘇聯消息報已互派記者。一九八六年，首批蘇聯文、數專家已到中國大陸，擔任文化與教育工作。^{③⑨}近一、二年來，雙方大眾傳播逐漸加強對對方國內情況的報導，大多是正面的。

六、邊境關係日益改善，邊界談判已恢復。中共與蘇聯邊境直接貿易於一九八三年恢復，數量雖然不大，但成長迅速。一九八三年邊貿總額為六百三十萬盧布；一九八四年升至一千五百六十萬盧布，增加一倍多；一九八五年為二千四百二十萬盧布，較前一年增漲將近百分之六〇，是一九八三年的三倍多；一九八六年約三千萬盧布（約值四千五百五十萬美元），約增加百分之二

註③④ 巴夫林（E. Bavin，蘇聯外貿部副部長），「蘇聯與中共：商業關係的前景」（“SSSR-KNR: Perspektivy delovyykh Otnosheniy”），經濟報（*Ekonomicheskaya Gazeta*），第七期（一九八七年二月），第二〇頁。

註③⑤ 「蘇中（共）談判」（“Sovetsko-Kitayakie Peregovory”，消息報，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二日，第十二頁。

註③⑥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日，第六頁；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第五頁。

註③⑦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二頁。

註③⑧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三頁。

註③⑨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一頁。

註③⑩ 第六個五年（一九八一—八五）計劃期間，中共共聘請了二萬三千六百多名外國文化教育專家，這些專家來自世界五十多個國家；一九八六年，蘇聯祇派遣十三人。參見，大公報，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一頁；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頁。

十四。④一九八六年初，中共與蘇聯協議，恢復內陸交通線相互使用。一九八六年七月，中共開始復建北黑鐵路，從北安至黑河市（璦琿），全長二百四十一公里，預計三年後完成，可與蘇聯鐵路相聯接。此外，從迪化（Urumchi）到蘇聯德魯日巴（Druzhba）之鐵路將於一九九〇年完成。⑤一九八七年二月，雙方恢復邊界談判，歷時兩週。會後，雙方表滿意。雙方協議，全面合理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中蘇邊界問題，從邊界東段開始。⑥下一輪中蘇邊界談判將在北平舉行。

徵諸前述事實，自從戈巴契夫當權後，中（共）蘇聯係中，出現了下列特點。

一、高層對話的序幕業已揭開。一九八六年四月，蘇聯首先提議與中共舉行高峯會議，遭北平拒絕，認為不切實際。七月二十八日，戈巴契夫再度提出，願意在「任何級別」上與中共討論問題。九月，鄧小平表示，祇要越南問題獲得解決，他願與戈巴契夫會晤。這不僅顯示，雙方實際掌權者已進行間接對話，而且已揭開高峯會晤的序幕。

二、關係正常化意願升高。中共與蘇聯在言論中、有關文件中及各種交流活動中處處顯示，雙方都很願意繼續改善關係。雙方甚至在過去所堅持的原則上也發生了鬆動現象。例如，蘇聯承諾按主航道原則調整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國界線；中共則承認，雙方關係的改善不應損害第三國家利益的原則。

三、政治接觸與外交代表級次已提升。前幾年經常訪問中國大陸的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於一九八六年退休，由另一第一副總理塔里津取代。塔里津不僅兼任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而且是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其政治地位與實際權力皆比阿爾希波夫高。因此，去年九月他首次訪問北平時，是一九六九年以來訪問中共級別最高的蘇聯官員。去年四月，蘇聯任命前駐聯合國大使特羅揚諾夫斯基（O. A. Troyanovsky）為駐北平蘇聯大使，提高了其駐中國大陸大使的級別。⑦

四、多面接觸，交流頻繁。在過去兩年內，雙方各項訪問團明顯增加。從服裝表演、漢學會議、文教與經貿訪問團，到政府代表團絡繹於途。除了黨際關係外，雙方幾乎已達到全面接觸。

五、互不批評內政，對多數重大國際問題的意見漸趨一致。最近兩年來，中共與蘇聯皆避免公開批評對方內政。在經濟改革上，彼此意見漸相接近；有時，彼此認可，甚至相互學習、交換經驗。在若干重大國際問題上，立場近似或相同。例如，雙方皆

註⑦ 基瑞揚諾夫（A. Kiryanov）和基理揚諾娃（M. Kiryanova），「蘇聯與中共：邊界貿易」（“SSR-KNR: Prigranichnaya Torgovlya”），對外貿易（*Vneshnaya Torgovlya*），第一期（一九八七），第一四、一五頁。

註④ 同註④，第十六頁；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一頁。

註⑤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⑥ 新時代（*Novoe Vremya*），第二十三期（一九八六），第二十三頁。

反對南非的政策、批評美國的「星戰計劃」、苛責以色列、支持南太平洋無核區主張、呼籲裁軍、支持不結盟等。但是，在若干亞洲區域問題上，歧見仍大。

六、相互寬容程度顯著增加。去年七月，中蘇邊界發生交火事件，雙方皆以低調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據報導，九月間一枚蘇聯彈道飛彈在從一艘潛艇發射後，偏離航道，墜落在中國境內。^④對此，中共未提出任何抗議，僅以「無可置評」了結。去年十月，蘇聯已停止干擾「北京電臺」的廣播。^⑤同時，蘇聯已停止「八一」與「紅旗」電臺對中共的廣播。這兩個電臺皆設在西伯利亞，對中共進行宣傳戰，「八一」臺有七年歷史，「紅旗」有十五年歷史。此外，中共與蘇聯對於對方與美國改善關係的種種活動已較能容忍，不再相互尖銳批評。例如，今年三月初美國國務卿舒茲訪問中國大陸，蘇共喉舌真理報作出評論，語調溫和，並宣揚中共立場。^⑥這是以往所罕見的。

發展趨向

如果蘇聯仍在戈巴契夫的有效統治之下，如果中國大陸的情況無急遽轉變，中（共）蘇關係的改善乃自然趨向。目前，中共與蘇聯正從事內部改革，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由於這個緣故，蘇共二十七次將其「黨綱」（新文版）稱之為「為和平與社會進步而鬪爭的黨綱」；另一方面，中共六屆人大四次會議重申其「獨立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目前的情勢看，戈巴契夫的統治已日漸穩固；而中共方面的改革方針並未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遭遇重大挫折。在這些條件下，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將不會中止，其可能趨向如下。

一、雙方關係仍沿著雙軌發展。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開始以來，非政治關係發展較快，政治關係較慢。每當中（共）蘇關係在經貿、科技等方面有顯著進展時，北平通常強調，「三大障礙」如不克服，雙方政治關係難以順利發展。中共明知蘇聯一時不會做到，但在口頭上不斷重述，這是有作用的。第一，令西方對中（共）蘇關係的改善不必擔心，因為障礙存在，進展有限。第二，使中共握有有力籌碼，迫使蘇聯在其他方面讓步。第三，用以控制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速度，使其不致太快。從一九八二年以來，蘇聯在這「三大障礙」上從未作出任何實質讓步，但雙方關係已改善得很多。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對「三大障礙

註④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七日，第一頁。

註⑤ 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二日，第二頁；明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十三頁。

註⑥ 賽瓦斯契揚諾夫（S. V. Sevast'yanov），「舒茲訪問中共」（Visit Shultz to PRC），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第五頁。

「不會輕言放棄；因此，中（共）蘇政治關係的發展較緩慢與不顯著，而經貿文化等關係則較快速與明顯。」

二、高峯會晤為時尚早，黨際關係的恢復乃是時間問題。在最近期間內，「三大障礙」一時難以消除，因此雙方最高領袖的會晤尚不可能。此外，中共與蘇共恢復黨與黨的關係已經不是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時間與時機問題。目前，東歐親蘇共黨已分別與中共恢復黨際關係，今年六月中共國務院總理兼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將訪問東歐五個親蘇共黨國家。這些活動可為中（共）蘇恢復黨際關係鋪路。事實上，中（共）蘇恢復黨際關係與高峯會晤是同一件事。

三、中（共）蘇可能和睦相處，但不會結盟。雙方和睦相處符合彼此利益，中共與蘇聯皆曾一再表示此一意圖。但是，中共經常強調其獨立自主外交，決不依附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也決不同它們任何一方締盟或建立戰略關係；祇希望與蘇聯成為友好的鄰國。當然，蘇聯的目標決不止於此。

（本文作者為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中共的政治與戰略

本書係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中嶋嶺雄所著；趙倩、張隆義、楊怡芬等譯，曾永賢審稿。

本書旨在找出，自從中共政權明確的脫離毛澤東模式以來，迄今所歷經的各種軌跡，並對中共未來的發展取向作一預測性展望。全書十七萬字，計二九〇頁。實售精裝本新台幣二四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